

## 陳淑莊、邵家臻鬼話連篇

### 議事論事

文兆基

不諱言的說，被判罪成的「佔中九人」之中，身為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和邵家臻最是令人不齒。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雖是發動「佔中」的禍首，但他們表面上沒從「佔中」賺得私利；至於張秀賢和鍾耀華事發之時仍是大學生，想法變得激進的原因，明顯是受到校內的「黃絲」學者荼毒。李永達、黃浩銘、陳淑莊和邵家臻，他們則是政客，撈取知名度作為政治資本，才是他們參與「佔中」的動機，邵家臻更因此而在2016年選舉中贏得議席。

四人不同的地方，是戴耀廷自從提倡「佔中」的一刻起，陳淑莊和邵家臻已積極參與其中，前者為公民黨籌辦所謂的「佔中商討日」，後者則在自己任教的校內籌辦「佔中商討日」。戴耀廷當日為「佔中死士」搞特訓，教他們如何面對警方逮捕，以及行動前剃頭明志，陳淑莊也參與其中。「佔中」爆發後他們搭建的「大台」，二人亦曾擔任主持。律政司雖沒控告二人串謀公衆妨擾，但是誰也知道，二人根本是「佔中」的策劃者之一。

還記得當日的「佔中商討日」，二人不斷解釋「佔中」為何是「公民抗命」，承擔罪責是「公民抗命」的主要元素，但是到了律政司正式落案起訴的一刻，二人跟其餘七人一樣，全部選擇否認控罪。事到如今，九男女因「佔中」而獲罪，陳淑莊和邵家臻還要跳出來求情，懇求法院不要判處監禁。反觀作案時未滿二十一歲的鍾耀華，法例上其實可爭取法院判處社會服務令，他卻表示願意接受判刑，真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 為保護席堆砌藉口

當然，明眼人都知道，陳邵二人要求法院不要判監的真正原因，是擔心判監將影響他們的議席。根據《基本法》第79（6）條規定，議員在香港或區外被判監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便可解除其職務；《基本法》第79（2）條又規定，議員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便會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更重要的是，坐監除會使他們丟了議席之外，還有未來的參選資格。根據《立法會條例》第39（1）（c）（i）條，任何人被判監三個月或以上（不論是否獲得緩刑），該人便會在定罪當日後的五年內，喪失立法會的參選資格。是故，邵家臻以自己身患糖尿病，屬家中經濟支柱，作為懇求法官輕判求情理由，都只不過是一堆藉口而已。

說到求情，代表陳淑莊的資深大律師王正宇在求情時表示，她在控罪所提到的兩天裏，對於整個運動的煽動影響有限，又聲稱警方當年待至12月才清場，才是妨礙期長的原因之一。然而，根據英國著名的煽惑案例R v Higgin，任何人只需向另一人進行煽惑，不論勸誘別人犯罪或企圖犯罪成功與否，煽惑罪均已完成。此外，所謂煽動影響有限，即是承認陳淑莊確會煽惑他人。既然如此，當初她為何要否認控罪？

至於警方當年待至12月才清場，則是罔顧事實。只是警方認為，強行清場的效果適得其反，才改變了策略，等到「佔中」分子散得七七八八，才在法官發出禁令下令清場。況且，即使假定王正宇所言非虛，整場「佔中」的妨礙時間長短，跟陳淑莊在案發當日有否作出煽惑，邏輯上根本沒有關連。由此可見，陳淑莊為求減刑，真箇是鬼話連篇也。

時事評論員

## 朝俄落實舉行「金普會」

### 國際關係

延 靜

近來，關於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的消息很多，莫衷一是，昨日終得到朝鮮方面的證實。筆者認為，「金普會」早已提上日程，只是由於安全等方面的原因才遲遲公諸於世。

第一，金正恩訪問俄羅斯已議論很久。早在2015年，俄羅斯舉行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邀請各國首腦出席，其中就包括金正恩。當時朝鮮和俄羅斯之間來往也比較多，媒體猜測，金正恩上台後第一次出訪，很可能就是俄羅斯。但結果猜測落空，朝鮮派時任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名譽國家元首金永南赴莫斯科參加了慶典。那之後關於金正恩的第一次出訪又有幾次猜測，但都沒有兌現。到2018年3月下旬，金正恩第一次出訪到了北京，出乎外界的預料。

第二，朝俄對金正恩出訪有不同的考慮。俄羅斯比較急迫，希望拉近與朝鮮的關係，增加與美國對抗的籌碼。2018年5月，俄曾派外長拉夫羅夫訪朝，在金正恩會見時當面邀請他訪俄，並稱俄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國際經濟論壇，邀請各國首腦參加，此地離朝鮮較近，也許是一個好的機會。隨後俄方以總統普京名義對金正恩發出正式邀請，但仍然沒有請動。朝鮮則把金正恩的出訪，放在它與大國周旋中考慮。中國對美立場堅定，既談判又鬥爭，與朝鮮決定與美國舉行首腦對話，在對話博弈中謀求國家利益，兩者更加磨合，而且中朝又是近鄰，來往方便，於是金正恩先訪問了北京。

第三，第二次「特金會」碰壁後金正恩訪俄提上日程。金正恩與特朗普河內峰會不歡而散後，朝鮮十分惱火，也認識到與美國舉行無核化談判並非易事，需要擴充自己的對話籌碼。俄羅斯雖與美國針鋒相對，但也不拒絕對話和會晤，與朝鮮有一致之處，而且俄羅斯一貫主張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支持朝鮮與美國對話解決半島問題，金正恩訪俄將會爭取到更大的支持，從而在與大國周旋中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儘管莫斯科遙遠，但俄羅斯畢竟在世界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歷史上金日成、金正日都很重視朝俄關係，曾多次前往訪問，金正恩訪俄將繼承這個傳統。

第四，關於金正恩訪問俄羅斯的時間和地點，外界頗多猜測。當然訪問莫斯科與普京會晤最為正式，但畢竟路途遙遠，因此近來外界更多猜測是，普京參加4月下旬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前後，有可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與金正恩會晤。朝鮮最高領導人出訪，歷來很少事先宣布，金正恩訪問北京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也是事後公布的。因此，金正恩會晤普京的日期和地點，保密到最後時刻，不足為奇。

原資深外交官

## 香港需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

上星期，除了立法會《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選不到主席而鬧得滿城風雨外，還有兩件事值得留意，一是4月15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另一則是特首於一天後向中央政府提交、上周四公布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的報告》。

這兩件事的時間推進配合得天衣無縫，合起來傳遞的信息非常重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安全，香港必須理解及配合。

### 中央逐步推動國安意識

在2019年談國家安全，格局已比2003年談《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大很多，形勢也複雜得多。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首度提出「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經濟安全是基礎，還有網絡安全等等新型安全領域，在當時是個全新的概念。

之後在2017年的十九大工作報告上，習主席再強調：「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及「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推動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

然後，中央政府於今年2月26日向行政長官發出公函，要求行政長官就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提交報告。到3月的「兩會」，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提出，希望香港擔當國家安全主權的捍衛者，並指取締「香港民族黨」做法正確。

來到今年4月，香港已是連續四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第二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研討會中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 須認真探索香港的政治定位

城市的發展規劃需要定位，但香港一直以來只有經濟定位，沒有政治定位，或許這是長期重經濟輕政治偏見所致。

當然，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的體制與社會性質；一是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香港回歸後繼續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如果香港脫離中國獨立，便屬違反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不能容許。由於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因此沒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例如財產私有制，九七後一直在港實行，毫無動搖。

不過，除了這兩個憲法性的定位外，政治上還有許多模糊地方有待澄清。例如，國際上有關資本主義的討論已經不是非黑即白。資本主義有多種形態，英國與美國分別為一類，此外還有德國、法國、北歐、南歐，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堅持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卻在制度、文化、政策等衆多領域有所差別。於是，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究竟是哪種資本主義呢？

又例如，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這是被動式的界定。現實是動態的，「一國兩制」並沒有隔絕香港與內地其他地方的關係，也沒有否定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與國際的關係。但是這些內外關係應怎樣釐定呢？這都涉及香港的發展和「一國兩制」的具體內容。很可惜，回歸前後均沒有探討，形成政策的空白地方，由此產生衆多問題。

## 「一國兩制」對台灣有吸引力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早前率團訪問粵港澳大灣區，於15日抵達香港，拜會了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此事又引起台灣綠營的騁噪，罵其「賣台」。此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來港交流時拜會中聯辦，也被綠營扣上「為『一國兩制』背書」等帽子。

有消息称，繼韓、宋之後，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之子連勝文最近也要來大灣區參訪。台灣政界人士一方前赴後繼的來訪，另一方不遺餘力地厚罵，這些對立現象背後，是否意味着「一國兩制」實踐內涵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豐富，對台灣正產生吸引力，由此引發「台灣」分子的恐慌與對抗呢？

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構，處理涉台事務是國務院賦予它的五項重要職能之一。香港回歸後，港台兩地官方交往、台灣政治人物訪港等等，都要由中央政府拍板後才能放行。香港中聯辦在一線負責處理，這是它的職責所在，分內之事，合法合理，無可非議。

宋楚瑜行前在回答會否去中聯辦的問題時強調，唯有溝通才是化解誤解的重要方法，顯示出他的政治智慧。台灣政治人物對拜訪中聯辦都不介意，為何還有個別港台媒體大加撻伐？說到底，還是「逢中必反」「抗中拒統」心態作怪。

儘管香港已經回歸20多年，台灣和香港的一些人還是無法正視這一現實，對於「一國兩制」也極盡歪曲之能事。在這種心態下，將拜訪中聯辦「抹紅」，也就不足為怪了。

拋開「台灣」勢力這些口水，讓我們站高一點，看看宋楚瑜此行的目的。據台媒報道，宋表示目的有三：



### 焦點評論

葉劉淑儀

緊隨其後就是特首向中央政府提交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報告。

一步步發展下來，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從概念到實際推動、宣傳教育及實際行動等各方面逐步推進，強調國家安全及領土完整性的重要性，紅線畫得準確清晰。而香港在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香港社會需要理解及接受。

我們需明白，每個國家在不同時代，因應外在內在、國情及安全形勢不同，在國家安全的概念及評估也會有不同。

比方說，傳統的國家安全觀認為軍事和武力威脅才算是顛覆叛亂，但是來到今時今日，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軍事、恐怖襲擊只屬傳統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則越來越重要，包括金融、氣候變化、生態及資源危機。此外，網絡、海洋、太空、極地等則屬新型安全領域，逐漸受到國際重視。

而習主席提出的「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重點字眼是「總體」，即是要把上述傳統及非傳統各領域的安全都整合連結起來，要發揮協同效應，互相保護，不能單打獨鬥或互相壓制，終極目的就是要在這個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新時代，維持國家領土完整，保障人民安全。

中國正處於崛起的關鍵時期，發展是第一要務，這同時引發外部安全問題。國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推動高科技發展，挑戰美國這世界霸主的神經，引起反彈，引發華為事件。其實「中國威脅論」醞釀多時，特朗普上場，終於發起貿易戰，就是要遏制及圍堵中國，不讓中國崛起。

除了中美貿易戰，環境污染嚴重引發生態安全危機、能源消耗增多令能源安全風險加大、網絡發

展一日千里亦引發嚴重境外網絡攻擊，這些都是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外部安全危機。

基本法23條立法亟待完成

而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獨」思潮及「香港民族黨」的出現，可視為影響國家的內部安全。即使不論香港「獨立」必成孤島的災難性後果，以往我在很多公開場合解釋過，中央已畫紅線，香港沒有「獨立」的空間。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憲法會把分裂自己國家合理化的，人民不能把土地及該土地上別人的產權等等，從國家分裂出去，那已經違背了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和概念。

因此，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完全是正確做法，用行動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應有之責」。

總括而言，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對每一個國家而言都十分重要，西方很多民主國家也有國家安全條例，因為國家有生存的權利，亦有責任保護人民的安全。如果國家不能保護人民，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如果國家無法保護自己，不單令人民生命受威脅，或會讓他們變成難民，影響其他國家。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人民，以及不影響其他國家，各國都非常重視國家安全。中國沒有例外，習主席提倡的「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有充分解釋。

香港已回歸國家接近22年，距離上回《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果也16年了，其間國家經濟翻了幾番，其崛起使國際社會虎視眈眈。我認同王志民主任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中所言，「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本身就意味着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主權完整，香港的安全本來就是總體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香港要正視並解決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履行憲制責任，早日完成國家安全條例的立法。

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

加坡比較、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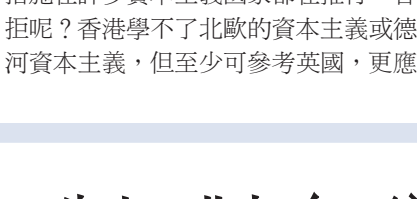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除要為本身的利益考慮外，也需要貢獻國家，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可能像回歸前港英當局的詭計，圖以治權換主權，把香港分割出國家發展之外，形成內地法制和經濟發展的法外之地，變成貪官污吏和逃犯的天堂。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便不能以傷害國家利益為方向，而應與國家發展相互配合，並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用香港資本主義體制的長處，補充內地社會主義的短處。這要求香港與內地的體制和發展須有良好的緊密聯繫，不能畫地為牢，也不能視內地為敵，對之排斥歧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中央政府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把港澳兩個特區納入國家重大的發展規劃中，但依然強調「一國兩制」。很可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沒有提出香港在大灣區、在國家發展的政治定位。因此經濟定位不清，只是重複港英時期已不停地說的所謂制度優勢，沒有探索香港（和澳門）應該和可以怎樣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分工協作；也沒有觸及在新的國際形勢中，香港的金融、經貿、教育文化應作如何的調整，和怎樣與內地合作。

要香港擺脫過往錯誤的政策，在新階段使「一國兩制」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便是把上述的政治定位認真探索和確定下來。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 議論風生

葉建明

一是考察粵港澳大灣區的台商轉型；二是看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台灣是危機、契機還是轉機？三是溝通兩岸，反對「台灣」，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平心而論，宋楚瑜這三點是很有眼光的，也精準抓住了當前台灣與粵港澳交流合作中的關鍵問題。作為政治人物，首先就要諳民心、接地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高雄市長韓國瑜如此，親民黨以「親民」為重，關心台商疾苦亦理所当然。

珠三角是30多年前台商登陸最早投資設廠的地方，香港、澳門則是冷戰對峙年代兩岸秘密溝通的平台，粵港澳與台灣的關係不可謂不深。如今，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對標紐約、三藩市、東京三大灣區，將「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的制度優勢融合起來，這一地區的發展前景無可限量。

經濟要發展，一定要開放，讓各種經濟要素流動起來，形成活水，才有生機。粵港澳大灣區秉持開放精神，旨在降低各種市場與行政壁壘，打造經濟發展的超級引擎，為港澳發展開闢廣闊天地，為內地企業生活搭建建新的橋樑，為大灣區的居民提供更優質的生活。這個「一國兩制」創新試驗場為台灣做出了示範，自然具有吸引力。

30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只有搭上大陸經濟發展的快車，台灣才能實現更好發展。面對急速飛馳的

粵港澳大灣區列車，台灣是搭車還是旁觀，結果大不相同。對台灣而言，如果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當然會迎來契機和轉機。台灣長期受困於「淺碟型經濟」，內需不足，缺水缺電等「五缺」制約企業投資，加上李、扁時期大搞「戒急用忍」，造成台灣經濟增長長期停滯。蔡英文上台後力推的「新南向」政策成效不彰。面對蓬勃發展的大灣區，無論是高新技術企業投資、科创研發、青年創業，台灣企業和個人都大有可為。同時這裏也會為台灣優質產品提供廣闊市場。韓國瑜在港、澳、深簽下的高雄農漁產品大單，就是明證。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會見宋楚瑜時表明，大陸歡迎更多的台灣朋友前來分享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遺憾的是，在民進黨當局刻意冷處理下，台灣民間對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不積極，民衆了解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抗中拒統」的「台灣」思維指揮下，台灣當局不斷限縮兩岸交流，升高兩岸對抗。對粵港澳大灣區，台灣陸委會以大陸促統工具視之，當然更不可能鼓勵企業前去投資。在民進黨當局看來，開放帶來的不是機會，而是危險，即使犧牲老百姓的民生福祉，也要守護「台灣主體性」。這種凡事都要政治掛帥，用政治凌駕經濟的思維，不禁令人想起當年民進黨「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的口號。

「一國兩制」對台灣沒有吸引力嗎？台灣當局斷言不要太早。春江水暖鴨先知，古人的講話很有道理。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